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俄国地理历史概况

一、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影响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从东欧平原一直到亚洲的太平洋沿岸。但这个大帝国的中心和发祥地，却是在东欧平原。因此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形成俄罗斯文明、俄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具有重大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

欧俄的地形特点 欧俄的地形单调，几乎只有一种地形，这就是四面开阔的平原。欧俄平原的北部是森林地带，南部则是一望无际的南俄草原。南俄草原与中亚草原相连接，游牧的亚洲人赶着畜群来到南俄草原，并不感到自己到了欧洲，而是如同在中亚草原上一样。俄语专门有一个词 *простор*，意为平坦开阔、一望无际之地，这个词在其他任何语言中都找不到对应词。

气候 由于地形平坦，风能够在整个平原上毫无阻挡地吹来吹去，故俄国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都没有像西欧和中国那样变化剧烈。黑海和波罗的海对这个巨大平原的气候影

响太小了，北冰洋也只对遥远的北部地方的气候起作用。结果虽然欧俄纬度不同，但各地温度变化并不太大。相反，不同经度，越往东，越往亚洲越冷。欧洲的西风主要集中在夏季和北部，亚洲的东风主要集中在冬季和南部，而且往往是东风压倒西风。整个说来，这个巨大平原气候寒冷，大部分地区全年近一半时间处于冰天雪地之中。较北之圣彼得堡，全年冰冻期为 5~6 个月，中部的莫斯科也有 4~5 个月的冰冻期。一般情况下，春季到 4 月才开始，而到 10 月初，莫斯科即见雪花飘飞，开始进入严寒的冬季了。

土壤植被 欧俄北部是沙土和粘土区，南部是黑土区；植被大致也分两种：北部是森林地带，南部是草原地带。在欧俄，森林面积约占 40%，草原面积约占 40%，其余最北部的苔原地带约占 10%，最南部的沙漠地带约占 10%。

湖泊、沼泽与河流 欧俄平原的北部和中部到处都能看到湖泊、沼泽。欧俄的河流几乎都起源于中部的湖泊和沼泽。沼泽地区约占欧俄地表的 $\frac{1}{5}$ 。由于土壤松软、平坦，水流能从各个方向找到出口，使河流系统复杂，各流域非常接近，其支流几乎交织在一起，一些地方则形成连水陆路。河水落差小，河流曲折，流域面积大，易于通航。

欧俄河流都是南北向，西伯利亚的河流也是如此。欧俄境内的河流往往由北而南：第聂伯河、顿河流入黑海；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入里海。西伯利亚境内的河流多由南而北：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都流入北冰洋。

(二)自然地理环境之影响

大平原之上的森林、草原、河流及其严寒的气候，构成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环境条件。

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西欧国家相比，俄国缺乏西欧地理环境的多样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单调的平原。单调的平原必然使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而职业的单调又容易造成习俗、道德风尚和信仰的一致。这样，如果不考虑外来影响，生活在欧俄平原上的人民所建立的国家，就自然应是具有保守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俄国历史学家 C.M. 索洛维约夫说得好：“东欧平原无论多么辽阔，无论在最初居民部落多么不同，但迟早都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地区。明了这一点，则俄国国家地区的辽阔，各部分的千篇一律及其相互间的牢固联系，便可以理解了。”^①

与亚洲国家如中国相比，欧俄又不如中国那样封闭。欧俄平原是四面开阔之地，极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实际上，北欧的诺曼人和南部的拜占廷人、西欧的日耳曼人和亚洲东方的游牧民族，都曾对欧俄地区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这就使它具有了西方和东方两方面的文化因素。同时由于四面开阔，不是邻人经常去冲击它，就是它紧密团结起来向四面扩张，这既是俄国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外部条件，也是俄国长期扩张的本源。

欧俄居民沿着大河聚集，大河是主要的通商航路，沿河产生了许多商业中心和城市，距离河流较远的居民则从事农业和林业，向沿河的商人供应蜂蜜、蜂蜡、皮毛等出口货物。俄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古罗斯时期，即是沿着第聂伯河，此后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在伏尔加河—奥卡河上游。这是河流的经济影响。河流的政治影响，在于沿着这些河流很早就形成了地方

^① C.M. 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的俄国史》第 1 卷，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60～61 页。

性的居民部落，俄国古代的编年史就是按河流一部落系统来记载历史的。在古罗斯原始部落的划分中，以及代之而起的各公国的划分中，很容易看出这种水文地理的基础。不过，河流虽划分为自然、政治的区域，但又并不隔绝。由于各流域十分接近，地形又平坦，使其能够保持往来，培养民族团结意识。此外，俄国人的移民方向，也自然首先是沿着河流流经之处。

南俄草原广阔的、无边无际的土地培育了古罗斯南方居民一种宽大深远的情怀。南俄草原与黑海接近，而黑海使第聂伯河流域的古罗斯很早就与南欧的文明世界发生直接接触。但南俄草原又与中亚草原接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古罗斯造成极大威胁，近千年来和草原上强悍的亚洲牧人敌对的邻居关系，使俄国人形成了对亚洲人的疑虑和不信任。草原的历史产物之一是哥萨克，其本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是俄罗斯的叛逆者、逃离者，但又是俄罗斯的捍卫者。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它与俄国北方森林中的僧侣形成对照。

与草原相比，森林对俄罗斯人要更为重要，因为正是森林奠定了俄罗斯国家的基础。17 世纪的西欧人来到莫斯科，莫斯科还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城市和乡村仅仅是森林中或大或小的空地。到 18 世纪后半期，大部分俄罗斯人仍生活在森林之中。俄语的农村（деревня）一词，词根即来自树（дерево）。森林给俄罗斯人以各种各样的帮助，从经济到政治甚至道德：用松树造房屋，用白桦作燃料、照明，穿用树皮做的鞋，靠森林中的软毛兽和野蜜蜂维持生计。森林还是最可靠的掩蔽所。俄国最初与草原联系，由于游牧民族的侵袭，没有获得成功。只有在远离基辅的地方，在森林的掩护下才巩固了根基。森林还向俄罗斯的隐居者提供了躲避尘世诱惑的庇护所，隐居苦修往往是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北方森林中的隐居者和南方

草原上的哥萨克正好形成对照。森林中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使人感到害怕，古老的树顶发出的那种低得无声的杂音似乎是什么不祥之兆，这都可能导致俄罗斯人心理上神秘主义素质的积淀。当然，森林更造成俄国农业发展的艰难，古代的砍伐农业，劳动繁重，使人疲劳、厌烦。^①

严寒的气候，使俄国农业季节短促。俄国大部分地区差不多与加拿大处于同一纬度。西欧农民有 8~9 个月的农耕季节，俄国农民只有 4~6 个月。俄国雨量稀少，春旱严重，不多的雨量又集中在夏季的收获季节。这些因素自古以来就造成俄国农业的低产。

二、俄国历史的分期

对俄国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分期，这当然是由方法论和所采取的分期标准不同而决定的。

18 世纪前半期，被认为是俄国第一位历史学家的 B. 塔季谢夫（1686~1750 年）从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政权的政治信念出发，认为俄国历史就是君主制的发展史。他的《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把俄国历史分成如下几个时期：

- (1) “专制统治时期”（862~1132 年）；
- (2) “采邑贵族政治时期”（1132~1462 年）；
- (3) “从伊凡三世开始的君主制恢复时期”（1462~1613 年）。

塔季谢夫的《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只写到 16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俄国历史学家 H. 卡拉姆辛（1766~1826 年）

^①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60—61 页。

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创造的，伟大人物的生活经历就是人民的历史。由此出发，他把俄国的历史与专制制度的历史等加起来，认为“人民的历史属于沙皇”，并把自己的历史著作《俄罗斯国家史》献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他写道：“俄罗斯是用胜利和一长制建立起来的，……并为英明的专制君主所拯救。”^①卡拉姆辛把俄国历史分为六个时期：

(1) “君主政权的前奏”——从邀请瓦良格王公到弗拉基米尔（862～1015年）；

(2) “专制政体的消失”——从弗拉基米尔到雅罗斯拉夫二世（1015～1238年）；

(3) “罗斯国家的灭亡与俄罗斯国家逐渐复兴”——从雅罗斯拉夫二世到伊凡三世（1238～1462年）；

(4) “专制政体的确立”——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1462～1533年）；

(5) “沙皇专制的重建和向僭主制的突变”——从伊凡四世到鲍里斯·戈杜诺夫（1533～1598年）；

(6) “大动乱时期”——从鲍里斯·戈杜诺夫到米哈依尔·罗曼诺夫（1598～1613年）。

卡拉姆辛的分期奠定了俄国历史分期的基础。

俄国史学家 C.M. 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从“有机发展”的理论出发，对俄国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他在其宏大的著作《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中试图阐明俄国历史事件的“内部联系”，确定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索洛维约夫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国家的自然条件”、“部落的自然条件”和

^① B.H. 阿斯塔霍夫：《俄国史学史教程》第1卷，哈尔科夫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外部事件的进程”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提。索洛维约夫承认国家、个人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他把国家看做“人民必需的形式”，把政府看做“人民认可的历史生活的产物”，认为伟大人物是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儿子。由此出发，索洛维约夫不是仅仅把俄国历史分成几个时期，而是强调俄国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一个阶段，从“氏族制度”经过“世袭领地关系”走向“国家方式”（从古代到 16 世纪）；

第二个阶段，准备走向新制度、彼得一世和改革时代（17～18 世纪中期）；

第三个阶段，实现改革的时代（18 世纪下半期～19 世纪下半期）。

19 世纪末的俄国大史学家 B. 克柳切夫斯基强调“殖民过程”（自然因素）“商业贸易”（经济因素）在俄国历史中的重大意义，并认为国家（政治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中有巨大作用。依据地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标准，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俄国史教程》中把俄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1）第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8～13 世纪）；

（2）伏尔加河上游的、封邑王公的、自由农业的罗斯（13～15 世纪中期）；

（3）伟大的、莫斯科的、沙皇一大贵族的、军事—农业的罗斯（15 世纪中期～17 世纪头 20 年）；

（4）全俄罗斯的、皇帝—贵族的、农奴制经济的、农业和轻重工业的时期（17 世纪初～19 世纪中期）。

苏联史学界的历史分期观建立在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与此相适应把俄国历史分为：

（1）原始公社制度（9 世纪以前）；

- (2) 封建主义阶段（9 ~ 19 世纪中期）；
- (3) 资本主义阶段（19 世纪下半期 ~ 1917 年）；
- (4) 社会主义阶段（从 1917 年起）。

他们把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又分为几个时期，以揭示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如把封建主义阶段分成三个时期：早期封建主义时期（古罗斯），发达封建主义时期（封建分裂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晚期封建主义时期（俄国历史的新时期，封建农奴制的危机与瓦解）。资本主义阶段也分成两个时期：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苏联历史则分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时期，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胜利时期，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的发展时期。

与苏联史学界的分期观念不同，俄国思想家 H 别尔嘉耶夫（1874 ~ 1948 年）1946 年在西方出版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把俄国历史分成以下五个时期：

- (1) 基辅罗斯时期（9 ~ 13 世纪）；
- (2) 蒙古统治时期（13 ~ 15 世纪）；
- (3) 莫斯科时期（15 ~ 17 世纪末）；
- (4) 彼得堡时期（18 世纪 ~ 1917 年）；
- (5) 苏维埃时期（1917 ~ ）。

别尔嘉耶夫的分期是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出发的，他的分期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思想史的分期。

1991 年苏联解体前，苏联人把从古至今的历史都通称苏联史；西方人把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做沙俄史，把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称做苏俄史，但都总称俄国史；中国人则习惯把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叫俄国史，把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叫苏联史。

苏联解体以后，史学界开始重新解释俄国历史的分期间

题。一些史学家又回到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等革命前史学家的分期，还有一些史学家则尝试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进行分期。例如，针对俄国历史发展过程有人提出了历史的选择性观念，或者从俄罗斯文明的角度来认识俄国历史并进行分期。

第二节 俄罗斯文明与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一、俄罗斯文明及其特点

近年来，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俄国人面临着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探讨俄罗斯文明的性质问题。

还在 19 世纪 30 年代，俄国宗教哲学家 И. 恰达耶夫就提出了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问题。不过他看到的这种独特性是：“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①

在恰达耶夫之后，19 世纪 40 ~ 50 年代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进行的论战中，在俄罗斯文明的性质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派把俄罗斯的未来和对它的认识放在欧洲的社会文化传统之内，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独特的、自给自足的文明发展。泛斯拉夫主义者 Н. 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斯拉夫文明是最有前途的文明，它首先在俄罗斯人民那里充分表现出来。这种观念在 19 世纪下半期兴盛一时。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俄罗斯文明看做拜占廷东正教文明

^①恰达耶夫：《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的子文明。

然而，更为风行的观念还是认为俄罗斯文明是独特的、混合型的“欧—亚文明”。它既否定俄罗斯文化纯粹的西方特性，也否定俄罗斯文化单一的东方特性，认为俄罗斯文明是西方和东方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这种“欧—亚文明”论不仅把俄罗斯同西方世界分开，还把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分开，坚持俄罗斯文明的独一无二性。而俄罗斯文明的独一无二性是由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西方和东方正好在俄罗斯相遇，而俄罗斯又拥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许多学者认为，俄罗斯文明的特点可以归结为：（1）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2）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3）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4）社会服从于国家。^①

应该说，俄罗斯文明的这些特点与古代东方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特点十分接近，但中国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形成原因却大不相同。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地位和政治—文化因素在形成俄罗斯文明的这些特点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首先，俄罗斯拥有辽阔的地域和大量的空闲地，这既引起农业生产采用粗放的耕作方式，也导致农民经常地进行移民活动。而不利的气候条件、较短的农业耕作期、收获的无保障又使农民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这一切都迫使俄国农民在土地使用和日常生活方面长期保存集体主义的农村公社传统，使土地所有制关系模糊不清，延缓了私有制的发展。同时，辽阔的地域也需要巨大的国家政权机关，以监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社会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

^① C. A. 基斯利钦：《俄国史问答》，罗斯托夫 1997 年版，第 48 页。

其次，俄国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俄罗斯文明的形成影响巨大。连续的军事冲突，对付亚洲游牧民族的侵袭，与西欧无休止的竞争，以及为寻求更肥沃的土地而不断进行的移民与扩张，都需要经常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俄罗斯国家往往以最极端的方式调整社会机构的职能，经常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私人领域，使社会服从于国家。这都势必造成官僚机构的专横，使社会下层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处于消沉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从而制约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地缘政治因素一方面使俄罗斯国家越来越紧密地卷入全欧洲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又使它凭借东方亚洲式的专制制度发展起来。由于靠近西方，历任沙皇政府在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下总不失时机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沙皇在权力问题上又决不让步，改革便走向了反改革；反改革当然不能持久，结果不是引起动乱就是引起革命；不过动乱或革命的结局，到最后还是建立了新的、更为强化了的国家机器。俄国留里克王朝（862～1598年）和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年）覆灭后的结局如出一辙，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正是俄国地缘政治地位制约的结果。如是，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表现为以下模式：改革→反改革→动乱或者革命→国家机构的强化。

最后，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因素表现为国家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国家主义文化以东正教思想意识为支柱，以俄国农民的集体主义心态和“好沙皇”思想为基础，长期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目的。只要国家能包容社会，包容一切，它并不拒绝以任何方式来改革国家机构。但不管是改革，还是动乱，甚至革命，最后的结局总是国家主义文化及其思想

意识的加强。

二、俄罗斯文明的分期

在俄罗斯地区有多少种文明，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 9 世纪古罗斯国家形成至今只存在着一种文明。它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基辅罗斯，从 9 世纪到 13 世纪末；（2）莫斯科罗斯，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末；（3）俄罗斯帝国，从 18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从中又分出第四个时期，即从 1917 年至 1991 年的苏联时期。

另一些学者认为在俄罗斯地区的文明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从 9 世纪到 13 世纪末为“欧俄文明”，或称“欧洲—罗斯文明”；从 14 世纪起到 20 世纪初是“欧亚文明”，或称“俄罗斯文明”。两种文明观的出发点是认为在 13~14 世纪之交开始形成新文明的原型，国家制度逐渐发展成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培植出一种独特的规范性价值观，从而构成俄罗斯欧亚文明的基础。这时社会的遗传因子发生了变异，俄罗斯从进化型的发展道路跨入动员型的发展道路，从“传统型”社会变为“动员型”社会。看来，两种文明观的理由似更充分一些。

古罗斯文明（欧洲—罗斯文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次文明：“基辅次文明”，“诺夫哥罗德次文明”，“东北罗斯次文明”；“西南罗斯次文明”。基辅次文明终止于 13 世纪，这是蒙古人入侵的结果。诺夫哥罗德次文明终止于 15 世纪，其时它为莫斯科大公国吞并。西南罗斯次文明是 15 世纪立陶宛罗斯建立的基础，立陶宛罗斯在与波兰联合后成为西欧文明区的组成部分。在东北罗斯次文明的基础上 14 世纪开始形成莫斯科罗斯，它成为俄罗斯欧亚文明的基础。

在俄罗斯欧亚文明的范围内可以分为“莫斯科公国”、“俄

罗斯帝国”和“苏联”几个次文明。苏联瓦解后开始了新的俄罗斯次文明发展的“后社会主义”阶段。

三、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

近年来，俄国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属于动员型社会的观念。他们认为，可以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分成几个基本类型：进化型，创新型，动员型。

进化型乃是历史自然的发展，依靠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相应条件的逐渐成熟，没有人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意识的干预。

相反，创新型和动员型社会发展的基础，则是依靠人们对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有目的的干预，以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其中，创新型是寻找和实施新措施的过程，有意识地培植社会发展的内部因素，例如像科学和技术这类可用来扩大人类生活能力的手段和措施，以提高社会生产率并扩大社会成员的实际消费水平，使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快速均衡发展。

与创新型社会不同，动员型社会一般是一定地缘政治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动员型社会的发展是在停滞或危机的条件下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有意识的干预，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世界。它往往采取特别的措施以达到特别的目的，以使现存社会制度得以继续保存。这样的发展过程一般是对外部强烈震动或刺激的反应。

动员型社会的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首先要利用某种情势，即当出现了威胁现存制度的情形时必须作出快速反应。

第二，动员型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必须非常明确，例如消除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或外部威胁，明确的目的是确定发展方向

的首要因素。

第三，从特殊的目的本身就可以产生集约性的手段，以尽快完成既定任务，因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这些任务是现存制度本身能够继续存在的条件，通常的手段往往是暂时中断现有经济机制并对社会财富和人力进行大规模集中。

第四，动员型发展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高度集权的管理制度，而国家是这种管理制度的主体。这种管理制度的优势是可以最充分地发挥权力的垄断职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用于主要方向，并十分有效地控制发展过程。同时这样的管理制度必然以超经济强制与服从为前提，并产生“权力万能”的幻觉。^①

当然，历史总是人有目的的活动。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的目的性越来越明确，人类对社会进程的有效干预程度也就越来越强，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类型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从动员型社会或进化型社会过渡到创新型社会。但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大体上总显示出一个基本的社会发展类型，其创新也总是在继承一定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并受到现存社会发展类型的制约。

四、俄罗斯动员型发展社会的特点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类型属于动员型发展社会。

俄国虽为大国，但文明起步较晚，其四邻不是远比它先进，就是远比它强大。古罗斯时期南俄草原上游牧的佩切涅格人与波洛夫齐人，13~15世纪封建分裂时期的蒙古人，17世

^① C. A. 基斯利钦：《俄国史问答》，第 53~54 页。

纪初的波兰人，19 世纪初的法国人，20 世纪前半期的德国人，都曾不时对俄罗斯地区发动过侵袭，使俄国陷入到特别的危机之中，从而也就迫使俄国政府经常采取特别的手段以应付危机。正是这些外部因素使俄罗斯成长为东西方之间辽阔地域上的“军事—民族”国家。正是这种地缘政治地位制约了俄罗斯以后的发展，压制了俄罗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内部需要，决定了俄国政治发展的趋势。

俄罗斯“军事—民族”国家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防和安全的持久需要。由于这种需要，国家实行对内的政治集权制度和对外扩张政策。这些政策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威信，把政治因素放在国家发展的头等重要地位，强迫人民以艰难困苦的方式来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同时，这些政策也保证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制止了内部的分裂趋势。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特点是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始终占据头等重要地位，中央集权的国家发挥了过于广泛的作用。政府一方面提出发展的目标，一方面以各种强制、监督、控制手段来迫使社会各阶层来实现这些目标。从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政府实行的措施不但往往是低效率的，而且还以自然资源的浪费、广泛使用强制性劳动和大量生产军用品为代价。

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滥用确实延缓了国家陷入危机的时间，强制性劳动在俄国更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强制性劳动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都是公开的形式，使用强制性劳动的不仅是农奴主，还有国家本身。从彼得一世时开始，政府不顾国家内部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强行发展轻—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这成为俄国的一个传统。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大量生产军用品则是政治因素第一的典型表现。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常常由外

部因素的制约来确定，而这些目标又往往超越国家社会经济条件的可能性。由于不反映社会经济内部的发展趋势，国家就仍以旧的社会经济方式来运作，并诉诸于自上而下的培植政策，来达到加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进步”结果。

第三个特点是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契机多与军事有关，如伊凡四世的特辖制改革，彼得一世面向西方的改革，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都与对外战争有紧密的联系。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第四个特点反映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为统治文化与被统治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俄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建立在世袭领地的基础上，从彼得一世开始又在社会上层推行“西方化”的文化政策；相反，大多数人的、社会下层的“默不作声的”文化建立在家长制的、国家主义的、肤浅的功利主义的、社会乌托邦的和世界末日论的基础之上。这就导致俄国社会文化的分裂。

文化的分裂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观的极端化，相互很难接近并进行文化对话。文化的相互不理解产生了社会冲突，并使冲突不能在协商、谈判和利益协调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社会下层的文化价值观受到压制，并造成了发生社会动荡的隐患。一遇到适当时机，受压抑的社会下层的价值观念就会如火山般喷发，造成动乱或革命。

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第五个特点是其具有周期性、循环性。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俄罗斯国家周期性地表演着“腾飞”和“垮台”的悲喜剧。有人认为，俄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循环周期：第一个循环周期（862~1238年）从古罗斯国家形成到蒙古人入侵；第二个循环周期（1238~1613年）从蒙古人入侵到“大动乱时期”；第三个循环周期（1613~1991年）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到苏联解体。

每一个循环周期都包括同样的三个阶段：“动员阶段”、“正常发展阶段”和“衰败阶段”。每一个循环周期的开始都与俄罗斯常规的社会危机有关。为了克服危机必须探索国家建构、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新形式，并大体上保持动员型社会的遗传因子。这种探索组成了动员阶段的主要内容。在每个动员阶段的末期往往出现杰出的国家管理者，并伴随着积极的领土扩张。正常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在新领土上迅速展开殖民活动，俄罗斯国家开始“腾飞”。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一些强有力的国家管理者和改革者。每个循环周期的最后一阶段是俄罗斯的衰败阶段，这是领土收缩、社会危机尖锐和俄罗斯国家的垮台时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国务活动家，他们试图以根本的变革阻止社会继续滑向危机的深渊。最初他们往往能取得一些成就，但总体上他们的改革以深刻的社会危机而结束。^①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俄国社会发展的旧轨道上另一个循环周期的开始，还是如俄国学者所希望的，是从动员型发展社会向创新型发展社会的过渡？但愿能如其所想。

第三节 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

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俄罗斯欧亚文明和动员型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

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一个“官方民族性”理论，断言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专制政体、东正教和民族性。”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完全是反动的，但确实又是对

^① C. A. 基斯利钦：《俄国史问答》，第 54 ~ 59 页。